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渊源及其思辨

张 欢 徐康宁

内容提要 本文对过往文献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和增长动力进行梳理,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学说的产生进行了逐本溯源。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学说的探讨也出现不小争议。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与否,本文利用国际人均GDP数据对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高收入组跨越成功和失败的划分,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跨越陷阱组国家平均耗时20-30年,而落入陷阱组国家长达40余年甚至更久仍滞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不过中等收入陷阱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对一国的发展也不是“魔咒”,因此增长陷阱并非普遍经济发展规律。

关键词 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停滞

张 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211189

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11189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银行2007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引发热烈讨论。许多国内文献认为是2006年提出的,原因是该报告名为《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但发布时间是2007年。自提出之日起,国内学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探讨就热度不减,尤其是在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众多学者对中国是否会落入陷阱的讨论更加达到高潮。国家财政部的时任部长楼继伟(2015)对中国增长前景表示担忧,认为老龄化加快会让中国有超过一半可能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无疑是“挤压式增长”的典型案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在2015年下了一个台阶,经济增速自1992年以来首次跌破7%，“十二五”规划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7.6%，预测这一数字在“十三五”期间会进而下降至6.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09AZD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71303206)阶段性成果。

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在学界更为普遍的提法是“拉美陷阱”。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世界银行认识到经济减速现象不光存在于拉丁美洲地区,已经蔓延至世界多个角落,还包括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也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阶段难以实现跨越。因此抛弃拉美陷阱这一特指说法,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更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而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型经济体来说,人口数量超过了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总和。中国大陆31个省际行政区中,27个人口数量超过千万,前10位超过5000万,前3位超过1亿。国际上较大的经济体,大多数人口数量仅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级行政区。因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更多是针对如何跨越陷阱的对策、建议类文献。然而,过往的研究者对陷阱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同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比如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是否具有地域特征?如果是,为何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能顺利跨越陷阱,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发展却一直徘徊不前?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端分界点是一国实现经济跨越的两个重要标志,所以是收入水平阻碍了一国经济持续增长吗?是否存在除收入以外的其它影响因素,比如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政局稳定等?因此本文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与否进行辨析,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逐一探索,与此同时对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进行理论和统计上的分析,以期为我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思路和借鉴。

二、学说渊源

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提出时间不长,不过有关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可能性以及对潜在原因的考察早已有之。李嘉图在其经典著述《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曾指出,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特征,这将引致一国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斯拉法,1962)。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经济发展带来高出生率,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反过来会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从而使人均收入长期静态收敛在较低水平,后人也称此为“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 1986)。市场经济作为不断向外扩张和深化的人类合作秩序,起到推动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关键作用,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此合作秩序的扩展受着未知因素的制约,即阻隔市场的社会因素和制度藩篱,或称为“布罗代尔钟罩”(De Soto, 2000)。Nelson(1956)通过研究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归纳出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人均收入转化为投资的边际倾向不高、可耕作田地已被开发殆尽、生产劳作方法的产出效率较低等。Nurkse(1952)研究则发现,资本形成率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受阻的主要原因。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处在低位,因此一国投资所需资金的供给欠缺,同时国民对本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不够,由此形成的双重缺口限制一国原始资本的形成和累积,致使欠发达地区长时间滞留在贫困陷阱。

中等收入经济体既有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又兼有着劣势和挑战。一方面,后发国家可以借助发达经济体现有的成熟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来缩小本国与先进技术前沿面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差距,达到经济和科技的“蛙跳式”发展(Brezis et al., 1993)。Veblen(1915)在其著作《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中提出,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较大的国家可以利用别国已有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展。Gerseh-enkron(1962)综合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发现后进国家的科技革新和经济发展依赖于其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并且与此差距是增函数关系。换句话说,伴随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后发优势所带来的效用呈现边际递减。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长期以来受国际分工地位中处于价值链“低端锁定”和不利于自己的贸易条款影响,成为发达经济体在技术

和经济上的附庸。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拉美国家的发展指导思想,因此“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使得部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得以提升;然而这造成拉美国家对中心国的依赖程度加重,国家不能施行自主的工业化政策措施,跨国公司的管控使其丧失技术和经济的独立性,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Prebisch, 1950)。拉美学者和专家试图从“依附论”视角阐释自身发展战略的失当,认为外方国家的管制和压迫和自身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才造成经济停滞不前。Acemoglu(2008)指出,经济增长的陷阱来自经济效率损失达到均衡状态,此状态因为市场失灵而难以自我修复。

世界银行统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区间而落入增长陷阱的国家中,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以往低收入阶段仰仗的发展战略在中等收入阶段失去可持续性。Kuznets(1971)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指为国民提供多样性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日渐提高,而这种能力提高是以科技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前提的。纵观世界大部分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价格比较优势布局其产业结构,而在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随着要素价格上涨,人均国民收入和技术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同时外部需应对欧美国家在高精尖端产业的挤压排斥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中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因此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学习红利边际递减而投入成本却边际递增,在占据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失去竞争力。Quah(1996)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制度改善和科技革新如果不能及时催生出增长的新动力,国家间将形成贫穷和富裕的“双峰(twin peaks)”俱乐部收敛。那么,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增长趋同并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很小,因此将会长期滞留中等收入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国内外学界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至今共发表48篇相关主题文章,知网、万方等每年收录的相关话题文章逐年递增(检索日期为2016年9月12日,下同),在搜索栏中键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陷阱”或者“发展陷阱”,可发现自从2007年此概念首次提出后,截至2009年共发表72篇论文,2010年则激增到194篇,2011年更是出现井喷现象,当年共计发表832篇,2012年则是首次突破千篇,达到1288篇,此后数年稳定维持在平均千篇以上。

反观国际论文数据库,在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检索后,输入搜索条件:(AD=China) and PY=2008-2016,论文类型包括文章(Article)、综述(Review)和述评(Editorial material)。发现全世界科研人员在2008-2016年间所发表SCI、SSCI收录的以“Middle income trap”、“Mid-income trap”、“Development trap”或“Growth trap”为主题的文章很少,共计65篇(其中SSCI论文60篇),其中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为12篇(全部为SSCI论文),占比18.5%。而SSCI收录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就包括中国学者蔡昉在China & World Econom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Cai, 2012)。从图2的总趋势可看出,2011年及以前相关论文发表量年均仅个位数,2012年开始大幅增多,并稳定维持在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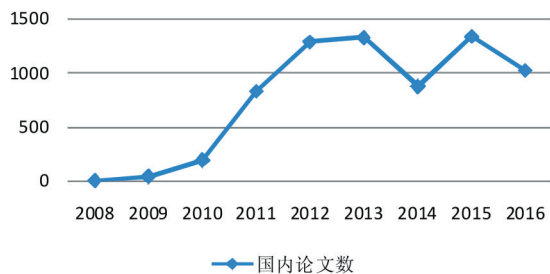


图1 2008-2016年相关主题的国内论文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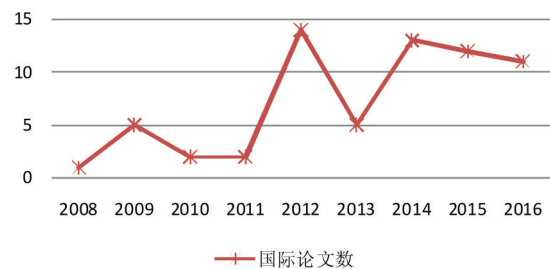


图2 2008-2016年相关主题的SCI、SSCI论文统计

余篇左右,不过这一数字与国内论文刊载量显然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国内和国际数据库所收录中等收入陷阱相关主题的论文数量不难观察到一些有趣现象:一方面,以SSCI论文发表量反映的中国整体人文社科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还不够多,说明中国人文社科的国际化程度急需提高;另一方面,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并没有在国际学术界成为焦点,说明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并没有被外国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可。相反地,尤其自从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进入发展新常态以后,国内学界则掀起研究此话题的热潮,形成“内热外冷”的有趣态势。

四、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

回顾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之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从国际上来看,巴里·艾肯格林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为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急速下降,由此引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Eichengreen et al., 2011)。马来西亚籍经济学家胡永泰(Woo, 2012)根据赶超指数识别出拉美的阿根廷和墨西哥,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中国需从五个方面防范潜在落入陷阱的可能:(1)不良贷款、国企过度投资和挪用公款所致的财政压力;(2)过于频繁的宏观稳定调节工具的使用;(3)社会和政治的治理缺陷加剧社会紧张局势;(4)环境问题治理不力危及可持续发展;(5)国际经济关系处理失当引发贸易冲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在其著述《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资本投资的年均长期受益远远高于劳动报酬年均长期增速,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存量的差距越拉越大,出现“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在全球新增长陷阱的背景下,收入差距的新鸿沟会带来消费动力不足,最终使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要保持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趋同步伐,前提是要营造透明、民主的经济政治体制环境。哈佛大学教授兰特·普利切特和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定量研究,实证检验结果得出一国经济减速与收入水平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十分明显,判断一国是否出现严重经济减速现象,主要根据是该国经济实际增速是否过快和超高速增长的时间长短;一国长期高速增长后的经济减速更多是统计上“向均值回归”的全球典型化现象,但如果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经济减速将会出现断崖式下落(Pritchett & Summers, 2014)。罗伯特·巴罗认为不能拿中国当孤立对象国看待,而是应置于跨国语境,综合其他类似发展中国家经验来比较分析。通过建立跨国面板数据进行条件收敛检验,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走高,中国经济增速已经由收敛约束渐变为收敛约束,因此可预见中国经济增速还将进一步放缓,在未来趋向“L”型走势是大概率事件(Barro, 2016)。

国内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比较主流的观点:吴敬琏(2008)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必须挖掘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并需要让这些因素发挥作用。警惕跟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福利赶超政策,由此致使拉美国家长期滞留中等收入阶段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樊纲、张晓晶, 2008)。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同时注重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可以帮助减弱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蔡昉, 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郑秉文(2011)通过研究指出,拉美地区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这对经济健康持续增长造成显著不利影响。不过,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适当存在反而会激励经济向前增长,但发展到中后期,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会损害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对长期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产生负向作用(蔡昉, 2008)。这正符合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相反地,徐康宁(2012)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被国内学者过度渲染和夸大,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等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落入陷阱是不妥当的;而且认为陷阱的含义和边界定义模糊不清,逻辑不够严密,学理上也讲不通,因此不能被当做普遍的经济学原理,也不能拿其作为经济

发展的规律和广泛现象。由于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予以严格准确定义,后来学者用相对收入赶超指数也有一定局限,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重点更多偏向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制约跨越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国民收入(GNI)、通货膨胀率和汇率(华生、汲铮,2015)。胡鞍钢等(2016)根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总结出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所要面临的挑战包括:城镇化建设、全要素生产率、被动依附性国际分工、生态环境和收入不平等。

五、到底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有不少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相对意义的“陷阱”并不存在。遵循这一思路,按过往研究成果,除去石油、天然气等的资源丰裕型国家,本文选取27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23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代法涛,2014)。其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洋洲有2个,东欧转型国家有4个,其他欧洲国家有15个,北美洲有2个,东亚有4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拉丁美洲有10个,东欧有4个,非洲有5个,东南亚有4个。

由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起始年份为1960年,所以本文均从1960年算起。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人均GDP在102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1026-403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4036-1247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12476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以此为参照,一国完成第一次跨越的时点需要人均GDP为1026美元,第二次跨越的时点为4036美元,第三次跨越的时点为12476美元。

从表1可看出,国际上一些率先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大洋洲、东欧转型国家、欧洲传统发达国家、北美洲、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从中等收入阶段跃升到高收入阶段的一般国际经验是要经过20-30年的发展历程(徐康宁、陈丰龙,2013)。从表1可以看出,最快跃升至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分别是冰岛、挪威、瑞典和中国香港,

都只用时20年。截至2015年最新数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组的国家人均GDP平均值接近39000美元。

对于各时点的划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国家人均GDP在上升且达到某一收入水平后,此后几年间出现经济衰退而重新回到原先收入阶段。例如,委内瑞拉1960年达到1056美元并成为中下等收入国家,但1964年回落到961美元的低收入水平,直到1968年升至1054美元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向下回落。因此,我们把委内瑞拉的第一时点定为1968年,而非1960年。对于其他国家和时点,本文都采取此认定方法。

表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分类

国家和地区	第一时点	中等收入陷阱			所耗年数	2015年人均GDP(美元)
		第二时点	第三时点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960年	1973年	1988年	29年	56328
	新西兰	1960年	1973年	1988年	29年	37808
东欧转型国家	波兰	—	1998年	2010年	—	12494
	捷克	—	1994年	2005年	—	17231
	匈牙利	1975年	1994年	2007年	33年	12259
	斯洛伐克	1985年	1995年	2006年	22年	15963
其他欧洲国家	奥地利	1963年	1974年	1986年	24年	43439
	比利时	1960年	1973年	1987年	28年	40231
	丹麦	1960年	1972年	1986年	27年	52002
	芬兰	1960年	1973年	1986年	27年	41921
	法国	1960年	1973年	1986年	27年	36248
	德国	1960年	1973年	1986年	27年	41219
	冰岛	1960年	1973年	1979年	20年	50173
	爱尔兰	1966年	1978年	1990年	25年	51290
	意大利	1963年	1977年	1987年	25年	29847
	荷兰	1960年	1973年	1986年	27年	44433
	挪威	1960年	1972年	1979年	20年	74735
	葡萄牙	1971年	1987年	2002年	32年	19223
西班牙	1969年	1978年	1990年	22年	25832	
瑞典	1960年	1970年	1979年	20年	50273	
英国	1960年	1975年	1987年	28年	43734	
北美洲	加拿大	1960年	1971年	1983年	24年	43249
	美国	1960年	1966年	1981年	22年	55837
东亚	日本	1966年	1974年	1986年	21年	32477
	韩国	1977年	1988年	2002年	26年	27222
	新加坡	1971年	1980年	1991年	21年	52889
	中国香港	1971年	1979年	1990年	20年	4242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分别于2003和2004年才升至中下等收入水平,在低收入阶段停留长达37年和45年之久,因此与其说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倒不如说是陷入了低收入陷阱。东南亚四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经历了经济腾飞期,实现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崛起的亚洲“四小虎”。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南亚四国经济持续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戛然而止,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集中爆发。在通过实施反危机和改革措施调整后,东南亚四国经济开始摆脱困境,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但经济增速始终无法达到危机前的水平。

表2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分类

		第一时点	第二时点 第三时点		所耗年数	2015年人均GDP(美元)
拉丁美洲	玻利维亚	2005年	—	—	—	3095
	墨西哥	1974年	1993年	—	43年+	9009
	哥伦比亚	1980年	2007年	—	37年+	6056
	哥斯达黎加	1976年	2002年	—	41年+	10630
	巴拉圭	1989年	2013年	—	28年+	4161
	乌拉圭	1973年	1993年	2011年	39年	15574
	阿根廷	1964年	1990年	2011年	48年	13589
	巴西	1975年	2005年	—	42年+	8539
	智利	1977年	1995年	2010年	34年	13384
	委内瑞拉	1968年	2004年	—	49年+	7745
东欧	保加利亚	—	2006年	—	—	6820
	罗马尼亚	—	2005年	—	—	8973
	俄罗斯	—	2004年	—	—	9057
	乌克兰	2003年	—	—	—	2115
非洲	阿尔及利亚	1977年	2010年	—	40年+	4206
	加蓬	1973年	2003年	—	44年+	8311
	摩洛哥	1988年	—	—	—	2872
	突尼斯	1979年	2008年	—	38年+	3873
	南非	1973年	2004年	—	44年+	5692
东南亚	马来西亚	1978年	2002年	—	39年+	9766
	菲律宾	2004年	—	—	—	2899
	印度尼西亚	2003年	—	—	—	3346
	泰国	1988年	2008年	—	29年+	58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由于陷阱组国家的玻利维亚、乌克兰、摩洛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尚未迈入中等收入陷阱区间,所以对他们的所耗年数不做统计。不过除了摩洛哥,其余四国进入中下等收入阶段的时间都较晚,在本世纪初才陆陆续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截至2015年,除了墨西哥、俄罗斯、马来西亚的人均GDP接近万美元俱乐部以外,其他国家都离高收入标准还相去甚远。20世纪90年代初的前苏联解体,实行多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结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的多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尝试,也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其他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与前苏联有很强的共性,也经历了一个由快速增长转为严重经济衰退的过程。

由于通货膨胀率、本币兑美元汇率的浮动和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因此高、中、低收入的国家分组标准所对应的门槛值每年都在增加。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过无论使用哪一年的收入标准去衡量,都能得到一致结论,也即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耗费年数基本都在20-30年,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长达4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长期处于“增长-回落”到“再增长-再回落”的循环怪圈之中不能自拔。

接下来比较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的人均GDP变动情况,我们选取2015年GDP总量在3000-5000亿美元以上的发展中经济大国作为考察样本。中国在2015年美元计的GDP总量为10.29万亿,虽然仍维持在万亿美元以上的俱乐部,但相较于2014年的10.38万亿美元,出现了首次负增长。虽然埃塞俄比亚在2015年GDP总量仅为615亿美元,不过自2003年以来取得经济平均增速11%的不错发展势头,成为非洲地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因此作为综合比较的对象也将其纳入进来。

土耳其和伊朗都在上世界70年代就早早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分别在2003和2007年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不过,由于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没有迈向高收入水平,因此也被认定为落

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在2015年人均GDP达到9130美元,已经比较接近万美元水平。在表3中,除了埃塞俄比亚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其余国家均已或早或晚地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沙特阿拉伯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石油和石化工业作为支柱,不过当地政府施行鼓励私有部门发展的经济政策,为迅速膨胀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同时旅游产业发达等要素支撑此国经济朝着多向繁荣发展。哈萨克斯坦2015年已进入人均GDP万美元的俱乐部。

表3 主要发展中大国的人均GDP

年份	中国	印度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埃及	哈萨克 斯坦	巴基 斯坦	伊朗	埃塞 俄比亚	尼日 利亚
1960	89	84	508	/	/	/	83	192	/	93
1965	97	122	385	/	166	/	116	248	/	117
1970	112	115	491	921	221	/	173	385	/	224
1971	117	121	457	1179	232	/	178	469	/	160
1974	158	167	930	6446	238	/	135	1454	/	402
1975	176	161	1139	6296	296	/	170	1582	/	437
1980	193	272	1567	16599	528	/	303	2440	/	871
1985	293	303	1367	7776	703	/	338	3810	233	344
1990	316	375	2791	7137	765	1647	372	2222	253	322
1995	608	382	2896	7556	964	1288	495	1598	134	263
1996	707	408	3052	8160	1063	1350	504	1964	145	315
2000	955	452	4215	8809	1461	1229	535	1664	124	378
2001	1047	461	3054	8316	1403	1491	512	1899	120	350
2003	1281	558	4587	9186	1148	2068	565	2241	119	510
2005	1740	729	7117	13274	1197	3771	714	3135	162	804
2006	2082	817	7727	14827	1409	5292	877	3647	194	1015
2007	2673	1050	9310	15947	1681	6771	954	4705	244	1131
2010	4515	1388	10112	18754	2668	9071	1043	6300	342	2315
2015	7925	1582	9130	20482	3615	10508	1429	5047	619	264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因此,比较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和阶段相类似的其他发展中大国后能看出,中国作为经济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在低收入阶段停留时间长的国家,综观整体发展历程已实属不易;同时进入中下等收入水平后,中国又能够相对较快地踏入中上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表现相对来说已经足以令人满意。与之相反地,那些早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比如埃及(1996年)、伊朗(1974年)却发展到至今,目前人均GDP反而还不及中国,落入了相对比较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

六、正名

理论和学说的进步离不开学界共同的争鸣、探索与思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自从提出之日起,就引来学界不一致的观点,但大多是“盲人摸象”式的争论,本文正是基于此为立足点进行探析。通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出现了国内学者和媒体反响热烈、而在国外学界遇冷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引发业内经济学人士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和内涵还没有被国际主流经济学家所广泛接受。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无论从理论定性方面,还是从数理定量方面都出现争议,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研究结论显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亚洲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20余年内就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由于社会政局动荡和冲突,则长期深陷低收入阶段不能自拔。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收入水平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并非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能否后续维持住中高速增长还取决于社会经济体制、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等因素。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给予东亚经济很好的预警作用,也确实指出了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初期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繁荣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退迹象。然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现象不能代表事物全部规律,也不能笃定其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会出现的事实,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特有现象,并不能构成普适性的经济发展原理。

参考文献

1. 楼继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落实措施》, http://www.qstheory.cn/politics/2015-04/28/c_1115110541.htm, 2015-04-28。
2. 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3. 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W. Pickering, 1986.
4. De Soto, F.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Basic Book, 2000.
5. Nelson, R. 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 (5).
6. Nurkse, R. 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2, (2).
7. Brezis, E., Krugman, P. and Tsiddon, D.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1211-1219.
8. Veblen, T.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cMillan, 1915.
9. Gersehenkron, A.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1962.
10. Prebisch, R., 1950. United Nation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Lake Success, NY.
11. Acemoglu, D.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Growth.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1.
13. Quah, D. T.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 (6).
14. Cai, F. Is there a ‘middle-income trap’? Theories, experiences and relevance to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2(1): 49-61.
15. Eichengreen, Park,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16919, 2011.
16. Pritchett, L. Summers, L.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2014.
17. Barro, R. J., 2016,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Especially to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872.
18. 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 [北京]《中国改革》2008年第2期。
19. 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 [北京]《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20. 蔡昉:《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2期。
21.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 [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
22. 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3. 徐康宁:《“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第3期(<http://theory.people.com.cn/GB/17498223.html>)。
24. 华生、汲铮:《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 [北京]《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7期。
25. 胡鞍钢、任皓、鲁钰锋、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 [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天 则]